

国学经典丛书

孟子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国学经典丛书

孟子

宁镇疆 注译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/宁镇疆注译. —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7.4
(国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48-2521-7

I. 孟… II. 宁… III. ①儒家②孟子-注释③孟子-译文 IV. 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7921 号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640mm×960mm 1/16 **印张:**17.25

字数:212 千字 **印数:**1—6 000 册

版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孟子

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,孟子与孔子一样,也是一位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古代贤哲。这不只是由于旧学私塾里依然沿袭了明清以来的做法,将《孟子》(“四书”之一)列为必读教材,而且,像《三字经》这样的童蒙读物,开头一段就和孟子有密切的关系: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。苟不教,性乃迁。教之道,贵以专。昔孟母,择邻处。子不学,断机杼。……”这几句或者是讲孟子的思想,或者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。古人说:“读其书,想见其为人。”我们不妨倒过来,先说说他的生平,再来谈谈他的书。

一、孟子生平简介

据《孟子》本书及《史记》等文献记载,我们知道孟子名轲,字则不详。^①他是战国时邹国人,这个“邹国”有的文献又称“邾”或“邾娄”,其地在今山东省的邹城市(原邹县),再往北不到一百里,就是孔子的故乡——今山东曲阜(两地现都属山东济宁市)。相距如此近的两个地方,先后诞生了两位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大师,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。

^① 关于孟子之字,赵岐说“未闻”,但魏晋以来,孟子之字有“子车”、“子舆”等不同说法,学者以为晚出,多存疑。

据赵岐的《孟子题辞》说,孟子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鲁国很显赫的贵族——孟孙氏。当时鲁国公室衰微,政权实际被孟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个世家大族(又称“三桓”)所控制。孟孙氏的嫡子就继承“孟孙”这一氏,^①其庶子就单称“孟”氏,这就是孟子之“孟”的由来。据学者考证,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左右。^②据说他父亲去世得很早,孟子主要是由母亲抚养成人的。他母亲仇氏在教育子女方面很有一套。韩婴编纂的《韩诗外传》及刘向编纂的《列女传》中都保存有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,从这些故事当中,我们可以看出孟母对幼年孟子的教育是非常用心的。但可能正因为此,才使得孟子本人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塑造。另一方面,孟子本人对母亲也是很尊敬的,《孟子》本书说其母亲去世之后,丧礼的排场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(《梁惠王下》)。其弟子乐正子对其的解释是“贫富不同也”,但恐怕也不能排除报恩母教的情结。当然,孟子恐怕更想不到的是,其母教育他的方式,两千年来一直作为母仪的典范,直到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。

关于孟子的师承,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说他是“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。也就是说他是子思学生的学生,具体师从何人,已无法考知。不过,就学术思想的主张来看,“子思”与“子思之门人”其实又具有一贯性。从《孟子》书中多处对子思的直接称颂来看,要说他的思想与子思有一脉相承之处,恐怕也不会有大的出入。所以,后世从荀子开始又往往将他们放在一起并称,^③即今天广为人知的“思孟学派”。

作为儒学传承史上先后诞生的两位大师,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,孔子与孟子生平行事也有一定的类似性。那就是短暂的出仕、聚徒讲

① 古代宗法严分嫡、庶之别,后者之地位是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的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从《孟子·尽心上》之“孤臣孽子,其操心也危,其虑患也深”也能获得些许信息。

② 杨泽波:《孟子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106页。

③ 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明谓:“子思唱之,孟轲和之。”

学、游历诸国、最后老而归国，或整理典籍、或著书立说。

孟子出游首先去的是齐国，这时齐国正是齐威王当政。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，齐威王也是一代雄主，孟子去齐一展抱负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。毕竟邹国无论就国土面积还是对当时天下政局的影响都太小。这次出游齐国，孟子曾与匡章交游，其他事迹可以考见的就比较少了。可以想象，他的那一套仁义学说对于意欲开疆拓土、富国强兵的齐威王来说显然是缺少吸引力的。所以，孟子与齐威王的关系，应该不会太投缘。甚至于连齐威王送给他的“兼金百镒”他也没有接受，认为齐王有收买他的嫌疑。

孟子游历的另外重要一站是滕国。还是在宋国期间，孟子见到了当时还在做储君的滕文公（滕世子），孟子向他讲述尧、舜之道，很受滕世子的赏识。从滕世子在宋国与孟子的会面看，他是一个乐于采纳孟子主张，能行仁政的人。他即位之后，便有机会把“仁政”付诸实施，天下仰慕他名声的人也纷纷到滕国来，滕国一时成为一些乌托邦学者的试验场，这也为不同学派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正面交锋的机会。正是在这里，孟子与当时农家学派的学者展开了有关社会分工的激烈辩论。从《孟子》本书来看，孟子与滕文公的谈话，充分宣扬了自己仁政的思想和主张。其中经济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。比如他从“仁政，自经界始”，进而勾勒他所憧憬的“井田”制度；还从三代的赋税制度，讲到他所理想的税率模式，等等。而且，他还每每把上述经济问题提高到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的高度来看待，表明他既把“制民之产”之类的经济内容看成是仁政的前提，也是仁教的前提。

约在公元前320年前后，孟子与其弟子又来到了魏国（亦称梁）。魏国在战国之初本是非常强大的国家，但到梁惠王统治后期，由于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，使其遭受重创。出于报仇雪恨，“愿比死者壹洒之”的动机，魏国积极招贤纳士。从魏国广纳人才的动机看，它是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的。所以梁惠王见孟子劈头就问“何以利吾国？”这种急功

近利的心态,使孟子很不以为然,孟子劝他不要舍本逐末,而应该积极地推行仁政。正是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,孟子系统阐述了他的仁政与民本思想,而且还为实行仁政设计了具体实施的办法。孟子的这套说教,《史记》的评价很准确:“迂远而阔于事情。”“迂远”和“阔于事情”都是指他不切实际,其学说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所以魏王最终还是“不果所言”。由于魏国当时也广纳贤才,这同样提供了一个不同学派人物直接交锋的机会,加之孟子本人的“好辩”,所以我们看到在魏国期间孟子还和景春、白圭有过辩论。^①在孟子到达魏国的第二年,梁惠王就去世了,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,但孟子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差,说他“望之不似人君,就之而不见所畏焉”(《梁惠王上》),而且与孟子的对答也不得要领。继续待在魏国已没有多大意义,孟子遂于公元前319年前后第二次来到齐国。

齐国这时和魏国一样,也是新君即位。不过新即位的齐宣王不是像梁襄王那样的庸碌无能之辈,而是希望积极有所作为,加之当时齐国的国势也较魏国强很多,这使孟子深受鼓舞,他甚至认为:“以齐王,由反手也。”(《公孙丑上》)宣王对他也是礼遇有加,据说孟子做到了“客卿”。孟子与齐宣王的问对是最多的,核心仍然是行仁政,告诫宣王要与民同乐,怜鳏寡,恤孤独,努力做到“为民父母”。这些谈话,更充分地诠释了孟子的“民本”思想。他对“民本”的强调有时甚至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:“残贼之人谓之‘一夫’,闻诛‘一夫’纣矣,未闻弑君者。”(《梁惠王下》)孟子所处的时代,随着变法改革的推行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,几大诸侯国都竞相强化国君专权,加大君臣之别。孟子却还幻想那种早期的一定意义的民主和平等,这不能不说是其悲剧性命运的一大原因。不想急功近利,又忠言逆耳,其第二次游齐的结果也就注定了。当时北方的燕国发生内乱,起因是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君位

^① 杨泽波:《孟子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82~83页。

让给大臣子之,引起混乱,齐国想趁机讨伐,向孟子征求意见。孟子表示赞同,因为他觉得燕王不得人心,出兵征讨是救民于水火。但齐人伐燕取得胜利后,并没有想就此罢手,而是想趁机吞并燕国,这就有悖当初孟子的初衷。孟子劝宣王撤兵,但宣王不听,后来诸国联军抗齐,齐军大败,宣王才感到“甚惭于孟子”(《公孙丑下》)。经此事变,孟子更加认定把行仁政寄托于宣王是不现实的,遂拒“万钟之禄”,辞卿位离齐返邹。

回到邹国的孟子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,这样的高龄已不适合远行游历,加之遍游诸国而主张不被采纳,估计孟子对此已不抱什么希望。诚如赵岐《孟子题辞》所说,孟子“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,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,耻没世而无闻焉,是故垂宪言以谕后人”。遂与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人潜心于文献整理和著书。孟子约于公元前 289 年去世,享年八十有四。由于孔子活了七十三岁,加之孔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,民间遂有“七三八四”之说,其实出于附会,未必有什么道理。

二、孟子其人其书地位的变化

关于孟子的思想和行事,我们主要是借助于《孟子》一书来考知。但这部书也非尽是孟子手著,《史记》的说法是:“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,述仲尼之意,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这就说明此书的编著,其弟子万章等人也是做了部分工作的。从司马迁所说看,那时《孟子》的篇数与今天所见一致,都是七篇(东汉赵岐把每一篇又分为上下卷,遂有十四卷)。但两汉之际,特别是东汉时期,《孟子》的篇数有所增加,刘歆《七略》、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应劭《风俗通义·穷通》、赵岐《孟子章句》都提到当时的《孟子》是十一篇,而且这十一篇有内外之分,赵氏分为内书七篇(即史迁所见),还有外书四篇,即《性善辩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。赵岐注《孟子》时敏锐地看出所谓的“外书”实出自后人依托,与孟子本人的思想有明显的距离。现在学者一般认为赵氏的这

一看法还是有道理的。^① 赵岐因此也就只注解了内七篇,所以后来这“外书”四篇就逐渐亡佚了。^②

《孟子》一书在汉代的图书分类中归入子类,即所谓的诸子传记,^③也就是说相对于地位尊隆的经书,《孟子》包括它的作者还远没有后世的地位。据说汉文帝曾经将《孟子》列为博士官学,但毕竟是昙花一现,没有什么大的影响。情况到了东汉稍微有所改变,出现了几本专门注解《孟子》的书,这其中就包括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。从书名来看,赵书是汉代典型的“章句”之学的副产品。章句之学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即所谓“分章析句”,然后逐句逐章作解。从篇幅适宜的角度,赵氏将每篇分为上下两卷,每卷内又依据文义和上下文关系,分出若干章。赵岐给每章都写了“章指”,即今之所谓“中心思想”。这一点对后人解读《孟子》一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赵氏对具体文句的训释也采取了当时经学诠释的常见套路,侧重于名物训诂。特别是他去古未远,许多文词古义犹能知晓,这些都使得赵书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《孟子》一书不可或缺的。除赵书外,东汉时郑玄、高诱、刘熙等人也都曾为《孟子》作过注解,但可惜后来都亡佚了。

从三国迄唐朝中期以前,孟子其人其书地位都没有大的变化,研究不多,仍然是低于经的较次一级的地位。唐初虽然仍强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,而且为此还专门搞了一次统一经学的“五经正义”活动,但唐初列的“九经”根本就没有《孟子》的份儿。这种情况自唐中叶以后悄然有了变化。据史书记载,公元763年一个叫杨綰的人,上书要求将

① 杨泽波:《孟子评传》,第121~125页;董洪利:《孟子研究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,154~160页。

② 《孟子》外书四篇,宋以降曾经复见,但其作伪之迹,昭昭可辨,因此在《孟子》一书的流传史上并不具有全局性的影响。详情可参考前杨、董二氏书。

③ 《说文解字》引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的“箪食壶浆”就径称“传曰……”。范晔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引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“以天下与人易,为天下得人难”,也称“传曰”。

《孟子》由“子”升为“经”，^①此事虽然最终没有被采纳，但也说明《孟子》一书的地位已引起人们重视。后来韩愈出于对抗佛学的需要，发现了《孟子》一书的价值（形上思辨），从而对《孟子》大加推崇，而且炮制出一个从尧、舜、禹、汤，直到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的所谓“道统”，把孟子列为继承孔子甚至是尧、舜之道的正宗，是所谓的“醇乎醇者也”^②，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孟子最高的评价。但毕竟曲高和寡，应者寥寥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后来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）所刻的所谓“开成石经”，虽然数量从唐初的“九经”增加到“十二经”，但仍没有孟子的一席之地。杨伯峻先生曾提到五代后蜀时，蜀主孟昶命将经书再次刻石，而且增加了《孟子》。^③但实际上后蜀二世而亡，《孟子》并没有刻石，而是延至北宋宣和年间由席贡补刻的。^④

孟子及其书的地位真正迎来历史性彻底地改变，是在宋代。^⑤ 儒学发展在宋代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理学。理学感兴趣的则是一些形而上命题的建构和论说，这方面他们在罕言性命的孔子那里却找不到多少资源，相反，《孟子》一书这样的内容却是很多的，^⑥像孟子关于心性、理气等的论述都让理学家们如获至宝。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尽管宋代理学家派众多，但在尊孟一点上他们却是一致的。^⑦ 在王安石当

① 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：“宝应二年，礼部侍郎杨绾上书言：‘……请依古察孝廉，其乡闾孝有仁义廉耻而通经者，县荐之州，州试其所通之学，送于省。……而所习经，取大义，听通诸家之学……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。’”

② 韩愈《读荀》，《韩昌黎文集》。

③ 杨伯峻：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“导言”第9页。

④ 马衡：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79页；以及杭世骏：《石经考异》卷下“蜀石经”条，收入《来斋金石刻考略外七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⑤ 徐洪兴：《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5期，1993年。

⑥ 董洪利：《孟子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00～201页。

⑦ 杨泽波：《孟子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65页。

政的宋神宗熙宁四年(1071),《孟子》正式取得经书资格,同时规定其书也是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人因书荣,随着《孟子》一书价值被重新发现,孟子本人的地位也随之提升。宋仁宗景祐五年(1038),地方官也依照尊崇孔子的方式在当时的邹县建立孟庙。宋神宗元丰六年(1083)朝廷又封孟子为邹国公,第二年又将孟子神位移至学庙中,配享孔子。宋光宗绍熙年间(1190~1194)刊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模仿唐代《五经正义》的形式,试图以官方的力量,将权威的疏解列为定本。这其中的《孟子注疏》题名是北宋名臣孙奭所作,但此书自朱熹开始就怀疑其为伪作,今天更是成为定论,但今天看到的清代所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却一仍其旧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继承二程之说,认为《孟子》列为经书还不够,他把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抽出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列,即所谓“四书”,认为这四本书的内容代表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和精髓,而且穷毕生精力亲为注解,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一书。这部书影响极大,朱熹的注解也被视为标准的解释,后世学子应试都要以此为标准,元明清三代情况基本如此。经由朱熹的工作,《孟子》一书的地位可以说进一步提高,而且更加稳固了。

元明清三代,孟子及其书的地位始终得到尊崇,而且其地位之隆升还有新的进展。元明宗至顺元年(1330),加赐孟子为“邹国亚圣公”的封号,这使孟子作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先师的地位得到最终确认。但孟子及其书的地位在明初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波折。以集权和极端强调君臣之纲闻名的朱元璋对《孟子》书中的“民本”内容很是反感,甚至说出“若此老生于当世,可得而免耶”的狠话,他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,御用学者秉承他的意思将孟子书中太过“刺耳”的内容刊削达八十五章之多,成所谓《孟子节文》一书。不过,对于朱氏的非孟举动,士人并非一味附和,有的甚至以死抗争,所以最后连专制如朱元璋者也只得让步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《孟子》所具有的影响和地位。明世宗嘉靖年间,将孟子由“邹国亚圣公”径改为“亚圣”,其地位又进一步提

高。另一方面,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叶,王阳明之“心学”渐成主流。王氏将《孟子》“知言养气”章的“集义”作“致良知”之解,^①并大加颂扬,由此主张“心即理”,或心外无理,可以说将孟子的“内圣”取向推向极致。其流弊所及,就是侈谈性命,束书不观,学风空疏虚妄。这就为清代汉学的出场提供了学术自身发展的理据。^②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,统治阶层也看出了《孟子》一书于维护皇权统治的独特价值,故而我们看到清初以来的几位皇帝每每于尊孟之事躬行践履,或撰颂文、或题匾额、或行祭拜。^③ 学术研究方面,由于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,在此潮流下,出现大批以疏、注、辑佚等传统文献学路数研究《孟子》的作品,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。焦氏之书形式上是传统的“疏”体(针对赵岐之章句),因此名物训诂之内容自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不过,焦氏之书并不墨守唐人“疏不破注”的规训,对于赵岐之注亦多有纠正,学者因此评价其“立论既极坚实,疏解又甚明晰”,堪称允当。^④ 同样是乾嘉学者,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却是以阐释“义理”见长,并以此作为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武器。其书从形式上讲虽仍是朴学的路数,^⑤但于思想之发掘(诸如理欲关系、理气关系等)实多有创获。戴氏这种对“义理”的独特兴趣,^⑥可以说是对乾嘉考据之学的反动,并因此使得他的工作具有介乎“传统”与“近代”的转承意义。^⑦ 晚清今文家、维新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撰《孟子微》一书,亦重在思想阐释,特别是他从《孟子》一书中发掘出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之类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语汇,其试图将孟子思想进行“近代化”处理的努力

① 黄俊杰:《中国孟学诠释史论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232页。

② 并非简单的所谓“文字狱”之类的政治高压。

③ 杨泽波:《孟子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474页。

④ 焦循:《孟子正义》,中华书局,1987年。该书附沈文倬之“点校说明”。

⑤ 比如从疏解一些基本的字词义入手。

⑥ 余英时: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,北京三联书店,2000年,第103~106页。

⑦ 黄俊杰:《中国孟学诠释史论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年,第291页。

是很明显的。

近代以来,孟子及其书先后倒了两次大霉: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及“文革”时期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这两次运动孔子虽然都是首当其冲,但作为儒家仅次于孔子的所谓“亚圣”,孟子及其书自然很难“置身事外”。《孟子》一书最受反传统者攻击的,莫过于其中的“劳心”、“劳力”之论。尤其是后一次运动,在意识形态观念高唱入云的情况下,孟子此论自然是众矢之的。时过境迁,客观地看,上述极端的做法与历史上封建王朝将孟子及其书奉若神明一样,都是不可取的。对待《孟子》这样一部在历史上具有长期影响,并因此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有很深塑造的书,我们今天还是应该多一点理性和历史的眼光。

三、孟子的思想

孟子思想表现于很多方面,以这样一篇“前言”的篇幅很难尽述其详。我们这里只能就其中较有特色者,略作介绍,虽不免挂一漏万,但庶几可作引玉之砖。

《三字经》的前两句说: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说的就是孟子著名的性善论思想。孟子的性善论在先秦诸子的人性论中是独具一格的,也是其王道或仁政思想的理论起点,所以要谈他的思想,还是要从他的性善论说起。

孟子人性本善思想的典型表述,就是其所谓的“四端”说: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”(《公孙丑上》)这里所谓的“四端”,就是为善的萌芽,更重要的是这些“善”的萌芽是人心所固有的,就像其在另一处的表述:“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。”(《告子上》)从这里来看,孟子所谓的“四端”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。孟子在一次和告子的论辩中,曾巧妙地阐述了人性为什么是“善”的。针对告子所说的性就像水一样,决诸东则东流,决诸西则西流,无所谓善与不

善,孟子指出:“水信无分于东西,无分于上下乎?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”(《告子上》)其实,水之就下的特点(或许不应该称“本性”)也不一定就是告子所否认的,但后半部分接着就说人有本性,而且是善的,这并不具有必然性。水之就下——这是经验的,是后天认识到的,是能够证明的,而人性本善这却是无法证明的。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不能回避,也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有趣的是,这样一种先验的理论,孟子有时又是通过“经验”的方式来论证,但却浑然不觉:“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,及其长也,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,仁也;敬长,义也。”(《尽心上》)这里,无论是孩童的爱其亲,还是长大的敬其长,其实都是后天人伦教化的结果,是经验性的。^①实际上,这是孟子典型的论证逻辑。当先验的“此事”无法证明的时候(或许他本人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),就援引经验的“彼事”来证明,诸如:“仁之胜不仁也,犹水之胜火。”(《告子上》)这种逻辑可称为比喻的逻辑,或意义的逻辑。^②它是中国特色思维逻辑的常见特点。

在孟子看来,先天即有的“四端”,不但是“善”的,而且还是最好的。所谓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”。孟子这种对先天即有的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的推崇还体现在他对王、霸功业境界的等第区分上:“尧舜,性之也;汤武,身之也;五霸,假之也。”(《尽心上》)出乎“本性”、发乎“本性”的尧舜才是最高境界,“身之”的汤武,“假之”的五霸,只能是等而下之的。它们所指示的方向,都是向内心求索,故而后世将其归之“内圣”一派。后来宋明理学大师,特别是明代的王阳明把这种向内心求索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高扬所谓“致良知”之学。精微玄妙自不待言,但也导致过于夸大“精神的力量”,就像孟子自道“仁者无敌”(《梁惠王上》),这也往往是一般唯心主

① 生下来就吮奶,那是生物性的本能,而非社会性的善恶。

② 谢维扬:《至高的哲理——千古奇书〈周易〉》,北京三联书店,1997年,第171~173页。

义先验论的逻辑结论。

既肯定人之固有“善端”，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因为这种“固有”而注定成为“善人”？在孟子看来，有了善端还只是解决了大前提，还存在后天如何保养、发挥的问题。所以他非常强调“养”的功夫：“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孟子认为，本有善端，但却行了不仁，做了坏事，这不是本性的问题，“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，而是后天环境养成的。“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他把人之为不善，解释成“良心”放失的过程。这样，孟子就把求学、修养的实质直接归纳为：“求放心”，找回本有的善心——这其实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正好相反：不是去找什么本有的善心，而是将本就粗糙、蒙昧之“心”约束，修养成为社会认可之“善心”，是“自然人”到“社会人”必须要完成的转变。不过，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“四端”说，也有超乎时代的进步意义。因为人人都有善心，人人努力都可修成，所以他承认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孟子这种人格平等的思想，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“生而平等”、“天赋人权”也有一定的相通性，虽然孟子也说：“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，但他这种人格平等的思想对于反抗后世封建社会的命定论，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。

后天修养、扩充人之本有的善心，要达到怎样的境界呢？这就牵涉到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问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孟子有两种概括：一则则为“浩然正气”，一则为“大丈夫”。关于前者，孟子说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谦于心，则馁矣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关于后者，孟子说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孟子的这两处概括，千百年来激励了许多在逆境中进行抗争的人，其中就包括类似文天祥这样可歌可泣的民